

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之源^{*}

——基于拉尼斯-费模型的研究

刘志忠 杨海余 王耀中

摘要: 中国具有资本缺乏、劳动力剩余的资源禀赋,同时要素市场分割,民营企业面临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宏观环境,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而建立在赶超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国有企业继续面临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相对昂贵的传统宏观环境,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民营企业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生产中,产量大幅度增长。国有企业继续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增长较缓慢。当配置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多时,经济增长偏向劳动密集的出口产品,这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关键词: 拉尼斯-费模型 中国出口增长 民营工业部门 自生能力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持续高速增长,1979-2005年,中国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8.14%,比同期全球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高约10.17%,比1951-1978年中国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高6.07%。出口贸易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经济现象,研究这一经济现象对于理解、评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具有普遍意义。

长期以来,很多国内学者和海外研究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专家在分析中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时,通常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上,对出口函数进行研究。的确,实际汇率的变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都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然而,“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它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隐含的分析前提,这与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中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保护、扶持和补贴的现实不符。因此,正确解读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之源,需要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纳入到中国出口增长研究中,从更

基本和微观的决策方面解释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这一经济现象,并回答谁是影响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决定者?其所处的环境有哪些特性?主要决定者在何种约束下做出何种决策?这种决策如何推动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以及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本文以劳动力剩余这一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为研究出发点,通过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纳入拉尼斯-费模型来对其进行扩展,并在经济转型的拉尼斯-费模型框架中,对二元经济结构与要素价格扭曲、资源禀赋与厂商产品选择差异、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对优势发挥及中国出口增长进行理论研究,在一个逻辑一致的框架内,充分描述经济转型过程中种种经济现象的相互关联和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考察转型经济的初始特征,在简述拉尼斯-费模型基础上,分析其对赶超战略下劳动力剩余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并修正拉尼斯-费模型的设定;第三部分考察封闭的转型经济的发展,在加入不断商业化的民营工业部门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后,拉尼斯-费模型所预言的经济发展得以实现;第四部分考察开放的转型经济

* 本文获得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中的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战略调整研究》(04JD06)资助。本文作者感谢美国迈阿密大学经济系主任 Michael Connolly 教授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的发展,在加入要素价格扭曲与厂商产品选择差异后,民营工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增长导致了偏向出口型经济增长,并最终推动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最后总结中国出口增长机制。

二、赶超战略下的拉尼斯-费模型:初始特征

(一)拉尼斯-费模型

拉尼斯-费模型假定劳动力剩余经济以两个部门共存为特征,自然农业部门比较庞大但极端停滞,并靠制度的力量决定工资率,现代工业部门比较小但在不断商业化。经济生活中存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是稀缺的,劳动力是充裕、甚至是剩余的,土地和劳动力被农业部门用来生产农产品,资本和劳动力被工业部门用来生产工业制成品。在这些基本模型设定下,拉尼斯-费模型表明成功增长的劳动力剩余经济会出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不断的再配置,“工业部门通过创新活动,连同由工业利润(K)供应资金的新资本货物的积累和主要以食物与原料形式提交工业部门的农业剩余(F),能够吸收劳力。”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将释放更多劳动力(L),并为不断增加的工业消费品和资本品(C)提供市场。这将使农业人口相对于工业人口逐步减少,如图1所示,农业部门不断缩小,工业部门不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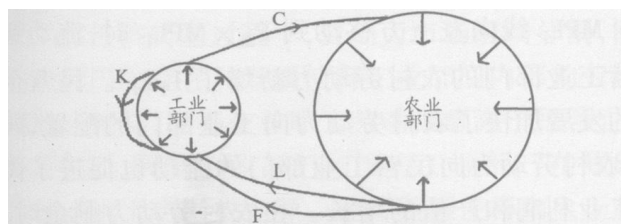


图1 拉尼斯-费模型的简化框架

(二)赶超战略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赶超战略与中国劳动力充裕、资本缺乏的资源禀赋并不相适应,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和设备需要进口三个基本特性,这既与中国利率水平高形成矛盾,又与中国少量的经济剩余分散在农村从而筹资能力弱形成矛盾。为解决赶超战略与资源禀赋不一致的矛盾,政府采取了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来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为降低筹资成本,把分散在农村的经济剩余转移出来,政府制定了农产品低价政策,农产品低价导致农产品短缺,这又促使政府在城镇实施农产品配给制度。政府明确粮食按城镇户口(即非农业户口)实行计划供应,由于城

镇户口是获得低价国家粮的前提条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开始表面化。

当政府只向城镇居民提供低价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时,对于农民而言,城镇就变得更具有吸引力了。与此同时,政府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强制性征购粮食,农民只对剩余粮食享有权利,当收成不好时,农民上缴定购后,余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这使得农村对于农民变得没有吸引力了。政府为实现农产品的统购,提高农业生产力而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使农村变得更没有吸引力。在自由迁徙的条件下,大量农民放弃土地、离开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到城镇寻找工作,并获得城镇户口。这一方面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进而导致农产品供给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城镇人口所需计划粮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短缺。针对上述问题,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对农民进入城镇做出了约束性限制。

由于以重工业为中心不可动摇,这意味着农产品低价政策不可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得以维持,农村劳动力有流向城镇或成为国有企业职工的强烈愿望,这必将加剧农产品短缺。为有效减轻农产品短缺程度,由赶超战略所内生出的制度安排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成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城镇居民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分别是供求双方,在基本禁止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城市条件下,政府实施全面就业的政策。

(三)赶超战略下的拉尼斯-费模型

在中国这种典型的劳动力剩余经济中,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内生决定了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这种典型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并不能实现成功增长。这首先表现在,内生于赶超战略的国有工业部门与拉尼斯-费模型的设定恰恰相反,它并未不断商业化。国有工业企业是生产资料或公有财产的经营者或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它的行为目标是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留利之和最大化,国家因此而对其实行直接计划管理,企业却因此并不具有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这决定了国有工业部门内部劳动激励不足、外部竞争缺乏、生产效率低下和创新活动极度缺乏,工业部门扩张能力有限。其次,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得工业部门可能产生的任何推动力量都不能触及自然农业部门的经济生活。虽然工农业部门继续通过农产品与工业消费品之间

的不等价交换而建立经济联系,但劳动力市场分割中断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再配置,工业部门不能通过吸纳农村劳动力来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实现成功增长。

三、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费模型:封闭情形

(一) 经济转型中的新兴劳动力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仍保留着其固有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一个以农村劳动力为供给方,以城镇民营企业为需求方的新兴劳动力市场不断成长壮大。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触动了低价农产品政策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政府在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长期未能解决的农产品短缺问题迎刃而解,城镇自由市场上有了充足的食物,这就解决了可能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的食品短缺问题,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城镇食品配给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也从两方面促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它解除了人民公社集体工作制度对劳动力个人时间自由配置的限制,在新制度安排下,农民可以对农闲时间进行自由配置,农民家庭可以对不同劳动力进行自由配置;另一方面,它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食品短缺问题的解决和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产生了新兴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被允许合法存在和发展,并作为劳动力的需求方进入新兴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村居民是新兴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供给者,传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就演变成新兴劳动力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也促使政府职责发生转变,营建自由、开放、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成为政府最重要的一个职责,让市场正常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阻碍,让每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进行以成本与收益分析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当新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同时出现时,政府在不改变传统城市劳动力市场固有基本特性的基础上,促成了新兴劳动力市场不断成长壮大。

(二) 民营企业与劳动力的配置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之间天然耦合的属性使得其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经济剩余和利润不断增多,民营企业资本积累增加。当民营企业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本增加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

时,这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

当劳动力总量为图2中的 $O_A O_S$,且劳动力市场分割时,因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劳动力流动,国有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只有如图2所示的 $O_S O_P$,农村劳动力人数为如图2所示的 $O_A O_P$,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分别为 P_A 、 P_M ,农业部门、国有工业部门、民营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线分别为如图2所示的 $P_A \times MPL_A$ 、 $P_M \times MPL_S$ 、 $P_M \times MPL_P$ 。图2中, $P_A \times MPL_A$ 、 $P_M \times MPL_S$ 和 $P_M \times MPL_P$ 的原点分别为 O_A 、 O_S 和 O_P ,民营企业进入农村劳动力市场,从 O_P 往左移动表示投入到民营工业制成品生产中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当农村劳动力总量为 $O_A O_P$ 时,这意味着投入到农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由于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部门工资是制度工资(CIW),如图2的CIW线所示。

当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民营企业逐步被允许合法存在和发展后,其利润实现及资本积累逐步完成,民营企业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本数量不断快速增长,这使其边际产品价值线不断向左上方移动。如图2所示,从 $P_M \times MPL_P$ 移到 $P_M \times MPL_P'$,并进一步移动到 $P_M \times MPL_P''$ 。这改变了农村劳动力在工农业部门间的配置,当 $P_M \times MPL_P$ 线与CIW线相交于E点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为 $O_A L_P$,在民营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为 $L_P O_P$, $L_P O_P$ 单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到民营工业部门。当民营企业资本积累使其 $P_M \times MPL_P$ 线向左上方移动到 $P_M \times MPL_P''$ 时,流动到民营工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新增了 $L_P L_P'$ 。民营企业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配置,同时,农村劳动力向民营工业部门的流动也促进了民营工业利润和产值的增长。在农村劳动力剩余时,民营企业向民工支付的工资等于制度工资,而国有企业职工因劳动力市场分割而获得较高的工资 W_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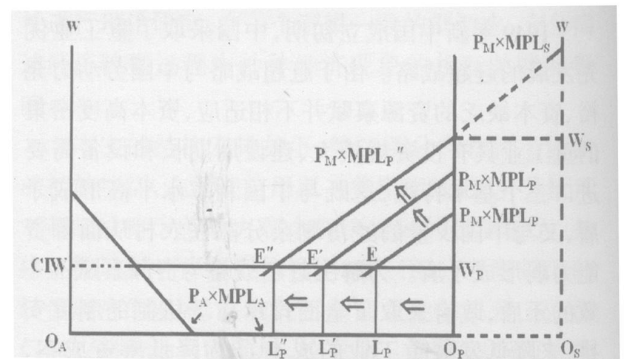


图2 民营企业与劳动力的配置

(三) 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费模型:封闭情形

经济体制改革允许民营企业合法存在和发展。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国有工业部门之外,存在一个

不断商业化的民营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发展既为民营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和更多劳动力,也为不断增加的工业消费品和资本品提供市场。民营工业部门则通过其创新活动不断增加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并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吸纳到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中。如图3所示,农业部门不断缩小,民营工业部门不断扩大,中国的经济转型实现了劳动力剩余经济的成功增长。不过,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虽然国有工业部门工资继续高于农业部门和民营工业部门,但劳动力并没有大规模向国有工业部门流动,国有工业部门生产增长较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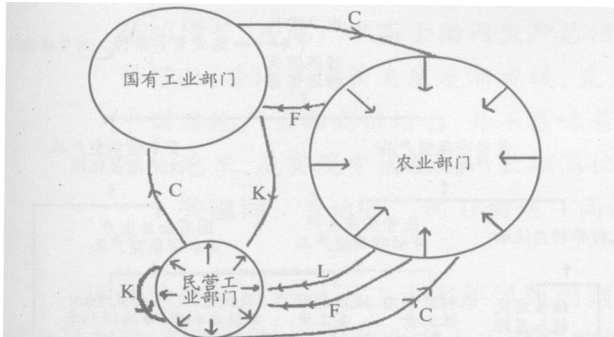


图3 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费模型:封闭情形

四、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费模型:开放情形

(一) 经济转型中的要素价格差异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继续分割,民营工业部门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工业部门内部的劳动报酬形成差异,国有企业职工劳动报酬高于民营企业。与此同时,民营工业部门与国有工业部门在筹集资金的成本上也形成差异。经济转型使得内生于赶超战略的金融制度安排不断变迁,城市金融市场由中国人民银行独家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由农村信用合作社独家垄断式的一行一社制金融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逐渐形成金融二元主义的歧视性制度安排,使得非正式金融市场和传统体制下有组织的正式金融市场相互分割、独立运行。在金融二元主义的制度安排下,政府人为地压低利率水平,限制民营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通过国有银行实施信贷配给优先支持国有企业,并最终形成两类企业利率差异。在体制内金融市场上,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分别是供求双方,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支付低利率。在新兴的体制外金融市场上,民营企业是主要的需求者,而供给者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民营企业向资金供给者支付高利率。

(二) 两类厂商产品选择差异与自生能力

当民营企业面临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宏观环境,而国有企业面临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相对昂贵的传统宏观环境,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要素相对价格(w_1/r_1)小于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要素相对价格(w_2/r_2)时,民营企业等成本线的斜率小于国有企业等成本线的斜率,如图4所示,民营企业等成本线CC比较平坦,而国有企业等成本线DD比较陡峭。

当市场上存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资本密集型商品Y,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要素密集度转换,且一种类型企业只能选择一种产品生产时,民营企业选择生产X商品,而国有企业选择生产Y商品。因为当民营企业选择生产Y商品时,其等成本线将从CC向右移动到 C_1C_1 , C_1C_1 与Y商品等产量线 $1/P_Y$ 相切于 F_1 点,这意味着相对于生产价值为1的X商品,民营企业生产价值为1的Y商品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增加,这促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企业选择生产X商品。与此类似,如果国有企业选择生产X商品,其等成本线将从DD向右移动到 D_1D_1 , D_1D_1 与X商品等产量线 $1/P_X$ 相切于 E_1 点,这意味着相对于生产价值为1的Y商品,国有企业生产价值为1的X商品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增加,这促使追求本单位净收入最大化的国有企业选择生产Y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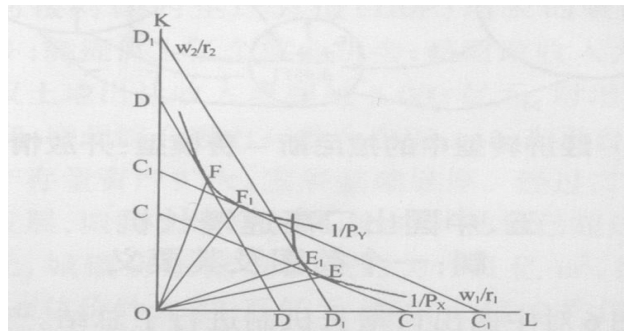


图4 要素价格与投入选择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正不断转变成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向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均衡相对价格不断趋近。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中国所具有的资本缺乏、劳动力充裕的资源禀赋决定中国厂商选择劳动密集型商品进行生产。当政府基于赶超战略干预国有企业的产品选择,国有企业被迫选择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生产时,厂商将不具有自生能力,此时,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不能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只有在政府提供补贴时,国有企业才可能存在。民营企业根据资源禀赋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

选择劳动密集型商品进行生产,具有自生能力。

(三) 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 - 费模型:开放情形

开放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具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形成出口(E)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M)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格局。具有自生能力的民营企业不断获得经济剩余、不断加快资本积累,并把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生产高速增长。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继续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增长较为缓慢。这使得中国出现了偏向出口型的经济增长,在贸易条件和消费者偏好变动较小时,这推动了出口贸易高速增长。反过来,出口贸易也成为中国经济成功增长的促进器,当国内部门不能为生产高速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提供足够大的市场时,民营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发挥依赖于国外部门的强劲需求。^⑪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为民营工业部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民营工业部门的发展又能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工业生产中,劳动力剩余经济实现成功增长。^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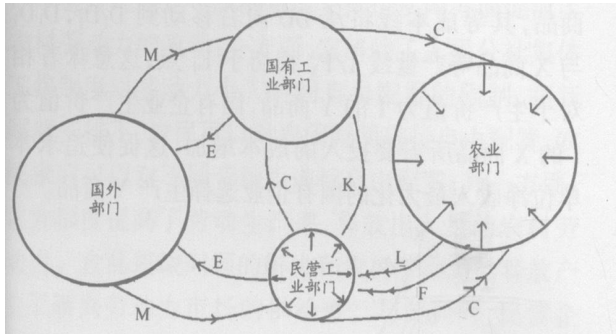


图5 经济转型中的拉尼斯 - 费模型:开放情形

五、中国出口高速增长机制:一个简图及其要义

图6对中国出口增长机制进行了总结。^⑬由于中国具有资本缺乏、劳动力剩余的资源禀赋,同时要素市场分割,民营企业面临资本相对昂贵而劳动相对便宜的宏观环境,选择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建立在赶超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国有企业继续面临资本相对便宜而劳动相对昂贵的传统宏观环境,继续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实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使得粮食产量和农副产品大幅度增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分流大幅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农村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和产业间流动加快。另一方面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合法存在和发展也促进了资本

积累和资本流入。民营企业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产品生产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而国有企业继续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并且在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向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均衡相对价格不断趋近过程中,越来越不具有自生能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增长较缓慢。当配置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多时,经济增长偏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出口产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偏向出口型的,在贸易条件和消费偏好不发生大的变化时,这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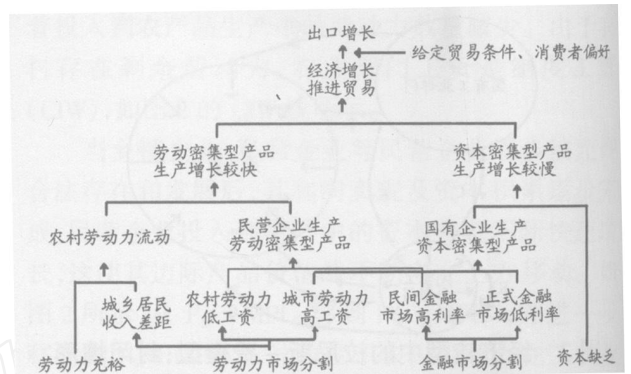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出口增长机制图解

注释:

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载《经济研究》,2002(12)。

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文版,1~26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54~268,263,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樊纲、张曙光、杨仲伟、张燕生、袁刚明:《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5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中文版,5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Lin, Yifu and Tan G., 1999. "Policy Burden,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 (2), pp.426-431.

Lin, Yifu, 2001.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The Inaugural D. Gale Johnson Lectur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14.

⑪王宏新、刘长庚:《存在“贸易顺差悖论”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探析》,载《上海经济研究》,2000(8)。

⑫王耀中:《民营经济与对外贸易》,131~135页,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

⑬王耀中、刘志忠、杨海余:《我国出口增长贡献主体替代研究》,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4)。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长沙 410079
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 410076)
(责任编辑:N、S)